

# 伯恩施坦

瞿季木

BOENSHITAN

江苏人民出版社

# 伯 恩 施 坦

瞿季木

江苏人民出版社

# 伯 恩 施 坦

瞿 季 木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盐城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2.5 字数 47,000字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3000 册

---

书号：3100·208 定价：0.18元

责任编辑 赵德水

## 引 言

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1932)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由于他第一个从马克思主义内部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修正”，所以，被人们称之为修正主义祖师爷；他在修正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也就被人们称之为伯恩斯坦修正主义。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出现在十九世纪末。当时，正是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已经战胜了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并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斗争并未就此停息，社会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代表人物，采用了比较巧妙的办法，在自己过去的“社会主义”招牌上，涂上一层夺目的油彩，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摇身一变，由假社会主义变成了“马克思主义”，来招摇撞骗，破坏工人运动。

这些“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为什么要冒充马克思主义呢？列宁说得很明白，因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①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就开始了同自己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的斗争。这个派别，就是伯恩

---

①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

施坦派。列宁说，这个“曾经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即修正主义”①。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有其较广泛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的。就阶级基础而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无产阶级并存的总是有着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大批小生产者加入工人队伍，这就不能不对各国工人队伍产生影响；就社会基础而言，资产阶级用一部分超额利润收买工人上层，培植工人贵族，形成资产阶级化的工人贵族阶层。工人贵族享有较高的待遇，在工人运动中散布资产阶级影响，使工人运动适合资产阶级利益，从而达到分裂工人阶级，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思想基础而言，自巴黎公社革命以来，资本主义长期“和平”发展，使许多国家的工人政党，在不同程度上染上了崇拜合法斗争的通病，这对第二国际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产生了影响。正因为如此，所以，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一出现就得到第二国际各国党内机会主义者的支持。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不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逐步取得了统治地位，而且，还篡夺了第二国际的领导权。并利用所窃取的权力，向各国工人政党发号施令，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遭到严重的破坏。

面对伯恩施坦这股修正主义逆流，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团结各国左派，进行了坚韧不拔、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从理论上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批

---

①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页。

判，而且还从实践上领导俄国无产阶级胜利地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一胜利，也有力地宣告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彻底破产。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破产了，但摆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面前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任务则是长期而艰巨的。列宁曾把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看成只是无产阶级不顾市侩们的种种动摇和懦弱，而向胜利迈进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sup>①</sup>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列宁这个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管是象伯恩斯坦这种“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还是以另一种面孔出现的“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其命运总是与失败相联系的，尽管它们有时也能风行一时，但终究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

<sup>①</sup>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9页。

## 目 录

- 引 言.....( 1 )
- 一、青少年时期和在党内的早期活动.....( 1 )
- 二、“苏黎世三人团” .....( 6 )
- 三、修正主义思想的滋长和形成.....( 12 )
- 四、背叛变节的作品——《社会主义的前提  
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23 )
- 五、“重新在社会民主党内找到了  
立脚点” .....( 35 )
- 六、为米勒兰的叛卖行为辩护.....( 40 )
- 七、争当帝国议会副议长.....( 45 )
- 八、“一对形影不离的朋友” .....( 49 )
- 九、从社会沙文主义到社会和平主义.....( 54 )
- 十、列宁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 60 )
- 十一、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68 )

## 一、青少年时期和在党内的早期活动

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年1月6日出生于德国柏林。他的父亲原是在行会中受过训练的白铁匠，后来当了火车司机。他的双亲属于犹太血统，并且都是犹太新教的信徒。

少年时代的伯恩斯坦多愁善感，常常为自己体质不好和很早眼睛就近视而苦恼。他甚至担心自己可能短命夭折，活不到二十岁，以致曾对自己的生命和前途失去信心，一直到成年仍是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过着懒懒散散的日子。

伯恩斯坦最初进的是一所七年制的私立学校，毕业后，升入一所九年制的完全中学。在学校读书期间，据他自己讲是从不懂得认真地、勤恳地读书和思想上力求上进。可是对宗教却很有感情。他是犹太人，根据学校规定可以不上宣扬基督教教义的宗教课。但是他经常去旁听，因为圣经中的人物强烈地吸引着他。星期天他常瞒着父母到附近的基督教堂去做礼拜。为了表示对犹太教的虔诚，他还向父母表示过要严格遵守该教不吃猪肉的习惯。

伯恩斯坦有个伯父，名叫阿隆·伯恩斯坦，是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柏林国民报》的创办人和社论执笔人，写过一些关于语言等方面的著作，得到过博士的头衔，在社会上颇有声望。阿隆·伯恩斯坦对他的成长起着一定的影响。伯恩斯坦自小就敬慕其伯父，在《自传》中提到



伯父时说过：“我对他给我的一些鼓励很感激”，在伯父面前自己“十分拘谨”，只是“远远地仰慕他”。

在青年时代，伯恩施坦受到资产阶级反对普鲁士君主专制运动的影响，因而具有一些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例如，在对待德意志民族统一的问题上，他曾和一些朋友偷偷地躲在地下室里，唱着《守卫莱茵河》和《德意志高于一切》等被普鲁士政府禁唱的歌曲，并在他们的外衣里面佩戴象征德意志的黑、红、黄三色彩带，以此来表示他们对普鲁士君主专制制度的不满。他以后一直推崇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康德<sup>①</sup>，这时已经开始影响着他。他说那时“康德这位品德高尚的同乡唤起了我的兴趣，他一直吸引着我。”

1866年，这时伯恩施坦十六岁，经他舅父介绍，到古滕克兄弟银行当了学徒。学徒四年期满后，即到魏玛一家银行设在柏林的支行做文书。这工作没做多久，1871年又转到了路特希尔银行担任同样的职务，在这里工作了七年之久。1870年普法战争发生后，他憎恨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准备报名当兵，参加对法国的战争，后来因为拿破仑第三在色当战役中被俘，法国很快地遭到失败而作罢。

长期地在银行工作，使他对交易所的黑暗内幕和资本家丧心病狂地追求利润的情况有所了解，对此，他曾表示过一定程度的不满，并和一些人组织了以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著作《乌托邦》命名的交谊会。可是他对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毫不关心，对欧洲和德国的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更无所知晓，甚至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

---

<sup>①</sup>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唯心主义先验论者、不可知论者。

都很少知道它的消息。直到1872年，他在一家酒店内偶然认识了一位社会民主工党<sup>①</sup>党员弗·威·弗里茨舍<sup>②</sup>以后，才和工人运动有所接触。有一次，他听了倍倍尔<sup>③</sup>的演说后，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sup>④</sup>等人由于反对普法战争而被控蓄谋叛国罪时所表现的英勇不屈的态度表示钦佩。从此，他开始参加社会民主工党所组织的活动，阅读了《爱森纳赫纲领》<sup>⑤</sup>，旁听了关于对《纲领》的讨论。1872年4月，伯恩施坦不顾他伯父的反对，正式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入党不久，伯恩施坦很快地就受到党内机会主义领袖之一伊格纳茨·奥艾尔<sup>⑥</sup>的赏识，并在奥艾尔的培养和指导下参加了党的宣传工作。为此伯恩施坦对奥艾尔十分感激，把这个老机会主义者称作“党的最英明代表”，“是他把我当

<sup>①</sup>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69年，是最早的德国工人政党，因成立于爱森纳赫城，又称爱森纳赫派。1875年它和拉萨尔派合并后，称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改称德国社会民主党。

<sup>②</sup>弗里德里希·威廉·弗里茨舍（1825—1905）：德国社会民主运动和工会运动改良主义活动家之一，原属拉萨尔派，1869年加入爱森纳赫派。

<sup>③</sup>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sup>④</sup>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sup>⑤</sup>《爱森纳赫纲领》即《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1869年在爱森纳赫城通过，故又称《爱森纳赫纲领》。

<sup>⑥</sup>伊格纳茨·奥艾尔（1846—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首领之一，机会主义者。在党内曾担任机关报主编、书记等职，多次当选为国会议员。

作鼓动家而‘发掘’（可以这样说）出来的。”

当时，德国工人运动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相当激烈，具体表现为马克思、恩格斯亲自指导的爱森纳赫派和机会主义的拉萨尔<sup>①</sup>派之间的斗争。伯恩斯坦十分赞赏拉萨尔提出的德国工人只要争得普选权，国家就会变成“自由国家”，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实现社会主义等主张。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机会主义不断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可是，伯恩斯坦却认为拉萨尔的机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没有什么原则分歧；他说拉萨尔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只不过“在某些方面把它庸俗化了”。因此，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之前，他就竭力主张与机会主义的拉萨尔派妥协。1875年，他参加了在哥达城召开的两派合并的代表大会。他把拉萨尔的亡灵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说拉萨尔的《既得权利制度》一书，对他来说“永远是最好的指南”。后来，他还为拉萨尔树碑立传，编写了不少有关拉萨尔的著作<sup>②</sup>，倍加歌颂，企图给这个机会主义头子扬名后世。

伯恩斯坦还十分崇拜杜林<sup>③</sup>。1872年秋，当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教程》出版后，他曾四处推销这本后来受到恩格斯彻底批判的坏书。1873年夏天，倍倍尔在狱中看

---

①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律师、小资产阶级政治家、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始祖。

②伯恩斯坦曾编著《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斐迪南·拉萨尔演讲论文集》和《斐迪南·拉萨尔给双亲和姐妹的家信》等书。

③欧根·杜林（1833—1921）：德国柏林大学讲师、折衷主义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

到的杜林的这本著作，就是他送去的。伯恩斯坦极其赞赏杜林的实用主义，并说：“杜林最使我称心的，是他对于社会主义中的自由主义因素的有力强调。”他还胡诌“杜林用其他人所不及的科学的激进主义补充了马克思，也可以说继续了马克思。”他反对批判杜林，胡说杜林和马克思之间的理论分歧是不重要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完全可以同时容纳下一个马克思和一个杜林”。实际上，伯恩斯坦在当时就成了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狂热信徒。他曾自供从那时起，“我开始以杜林批判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的学说原则了。”

伯恩斯坦在党内的早期活动证明，由于他是带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加入工人阶级政党的，入党后，又很少参加工人运动的实践，因而在他身上仍保持着小私有者的劣根性，使他很容易地沾染了机会主义，而没有能真正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所理解和崇拜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当时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较为流行的拉萨尔的机会主义和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

## 二、“苏黎世三人团”

1878年夏，伯恩施坦辞去了银行中的职务，经卡尔·施拉姆<sup>①</sup>的介绍，当上了资产阶级银行家、党内的改良主义者卡尔·赫希伯格<sup>②</sup>的私人文学秘书。

同年10月，德国反动政府以谋刺德皇威廉第一事件为借口，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诬陷，并颁布了由俾斯麦<sup>③</sup>提出的《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党人法》）。当时，大批党员被捕或被放逐国外，党的组织也被迫转入地下。在这严重时刻，盘据在党中央委员会和议会党团中的拉萨尔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大大地活跃起来。他们为了取得俾斯麦政府的一点“恩惠”，以便维持自己的合法存在，竟然要把党改组成改良主义的工人团体，甚至通过了自行解散党的决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

---

①卡尔·奥古斯特·施拉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者。

②卡尔·赫希伯格（1853—1885）：德国社会改良主义者，1876年加入社会民主党，创办和资助了不少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报刊，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③奥托·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顽固的保皇党人。在1862—1871年间任首相时，推行铁血政策，发动丹麦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以后一直担任德意志帝国首相，直到1890年。

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此时的伯恩施坦随着赫希伯格离开德国到了瑞士的苏黎世。

1879年7月，在莱比锡成立了新的党的领导机构，并指定赫希伯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即将在苏黎世创办的党报的筹备工作和财务管理。可是，这三个人却勾结在一起，排斥革命同志，利用当时党的领导人中存在的动摇和分歧，竟自封为党报的编辑委员会。他们把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新的党报，并声明“我们应当对新报纸如何刊载文章的问题保留决定权。”<sup>①</sup>他们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形成了一个反党的小集团，即“苏黎世三人团”。

这时，伯恩施坦开始目空一切。他在给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推荐的、准备担任党报编辑的卡尔·希尔施<sup>②</sup>的信中大耍官腔，指示党报只“应当采取原则的社会主义方针”，不许“热衷于政治激进主义”，实际上是要服从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办报路线，以致希尔施愤而拒绝这一职务。

不久，“苏黎世三人团”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的第一期上，用画三颗\*\*号作为署名，发表了一篇名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的批评性箴言。这篇文章公然把俾斯麦政府实行的《反社会党人法》，说成是由

<sup>①</sup>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77页。

<sup>②</sup>卡尔·希尔施（1841—190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

于党的“不适当的和过火的行为”，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怨恨才造成的，因而党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所以应该进行自我批评和反省。还污蔑主张暴力革命的社会党人是“爱好街垒战的无赖”，要党今后“在批评现存制度和建议改变现存制度时”，只能采取“平静、客观、慎重”的态度。党应该向政府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这篇文章提出了要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溶化在人类普遍的兄弟同盟之中”；并指责党在过去的工作中，过分重视了争取群众而忽略了向有产者请教。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要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敞开大门，成为“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工人阶级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有利于工人的一切东西。”

“苏黎世三人团”还教训党，应当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目标”。尽管他们说并不想放弃党的纲领，只是实现要延缓——无定期的延缓。这就是说人们接受党的纲领不是为了在一生中奉行它，而是遗留给儿孙们去实行。自己的全部力量和全部精力应当用于各种琐碎的事情，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补补缀缀的改良。这样，让人们看起来也是在做一点工作，而同时又不致吓倒资产阶级。

从上面介绍的内容可以看到，这篇文章是一篇充满恐惧的屈服于反动统治阶级压力的悔过书，是对过去德国工人运动的否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纲领。

恩格斯看到这篇文章后，对“苏黎世三人团”的错误立

场，以及他们对反动政府“这样的阿谀奉承作风”<sup>①</sup>，十分气愤。他立即和马克思商议决定，由两人一起反击“苏黎世三人团”对党的进攻。1879年9月17日—18日，他们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几位领导人传阅，而且说“我们不反对让苏黎世派也看看这封信。”这就是著名的《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它对“苏黎世三人团”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谴责。

《通告信》揭露了“苏黎世三人团”表面上也赞成党的纲领，但是他们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合乎历史规律的行动，推迟到遥远的将来去实现，以便可以和资产阶级尽情地和解、妥协和大谈其博爱。《通告信》揭露了他们面对敌人的打击迫害，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可耻地屈服；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这种态度完全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只能使工人阶级的革命走上失败的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中，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我们非常重视阶级斗争，因为它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特别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把这个阶级斗争勾销的人一道走；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不能和那些认为工人不能自己解放自己，而主张由仁爱精神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工人阶级的人一道走。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苏黎世三人团”是

<sup>①</sup>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1879年9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65页。



混入党内的“冒牌货”，不能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工作，也不能容忍他们再留在自己的队伍中。如果党的领导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说党受到了阉割，再没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应该明白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已经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明确地表示，如果新的党报是采取适合于这些人的观点和立场，那它就将是无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他们就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实行决裂。

9月19日，马克思又在给左尔格<sup>①</sup>的信中尖锐地批判了“苏黎世三人团”的机会主义言行，他指出：“这些家伙在理论上一窍不通，在实践上毫不中用”，他们只不过是“可怜的反革命空谈家”<sup>②</sup>。

《通告信》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鞭策下，党的领导机构谴责了“苏黎世三人团”的反党活动，并把他们排除出党报即《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委员会。这时，伯恩施坦慑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人运动中的威望，加之自己的羽翼尚未丰满，因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得不有所收敛，并在表面上承认了错误，言行上表现了一些向左转的倾向。因此，1880年12月当福尔马尔<sup>③</sup>辞去《社会

---

①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28—1906）：美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曾参加1848年德国革命，1852年侨居美国，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迁往美国后任总书记，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

②《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79年9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89页。

③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1850—1920）：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首领之一，机会主义者。